

# 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陈修良

## 前 言

孙冶方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杰出的经济学家、模范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研究他的生平，不仅是为了怀念，而是希望通过一个革命者的生平，看到中国革命历史的曲折性、复杂性、艰苦性。我们党有这样的一个好党员，这是党的光荣，中国劳动人民的光荣。我是和他长期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之一，遵照他的遗嘱，不要用眼泪与花圈去悼念他，但为了使他的为党的事业战斗了一生的模范事迹，成为广大人民学习的榜样，使他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学理论，能在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把他的生平事迹和主要的经济学理论观点撰写出来，这不仅是革命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是我这个老战友的不可旁贷的责任。

孙冶方同志 1923 年初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即 S. Y.），1924 年初转党，1983 年 2 月 22 日逝世，他为革命事业整整奋斗了六十年。这是道路上布满荆棘，坎坷而又曲折的六十年。其间他不仅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还受到来自自己阵营中暗藏的阴谋分子的中伤，但他始终坚信革命的真理，坚信党的事业必然会在中国取得胜利，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顶住了形形色色的逆风狂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冶方同志的六十年战斗生涯 不只是坎坷曲折的 同时还具有着革命的悲欢离合的传奇色彩，还是让我来从头说起吧。

### （一）第一任无锡党支部书记

孙冶方同志是江苏无锡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1923 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时，还只有十六岁，在无锡谯实学堂读书（旧制高小，等于初中程度）。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冶方同志原名薛萼果，孙冶方是他的笔名，又名孙勉之、宋亮。原籍无锡县玉祁镇。他生于 1908 年农历九月三十日。他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兼小地主，家里虽有四十亩圩田，但三年倒有两年荒，收入不足以糊口。因此，孙冶方同志还是依靠亲友的资助才进了中学，由此可见其家境的贫寒。他的父亲曾先后做过药店的学徒，有钱人家的账房先生，纱厂小职员等，每月工资只有十余元，一直工作到六十五岁，还清了债务，才辞职回家养老。这样的家庭经济，属于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在家做摊贩。二哥是小学的体操教师出身，后来成为无锡大资本家荣宗敬家的纱厂总管，赚了大钱，也成了小工业资本家，还在政界里有一定地位，属于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派，抗战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任过参议员。三哥是上海先施公司的小职员，第一次大革命时因领导罢工被辞退，在家开石灰窑，家境不佳，同情革命。1920 年冶方同志考入无锡市第一高小（即谯实学堂）现在的连元街小学，即是他的母校旧址。他在童年时爱好音乐、戏剧。1924 年 4 月 6 日的《无锡报》刊载过一则该校举行游艺会的消息，当时他主演了新剧《炊黍梦》。他还喜欢看中国旧小说，但五四运动唤醒了青年一代，使他产生了爱国思想。加上由于家庭经济的困苦，又使他对

旧社会的压迫，发生了强烈的直觉的反感，萌发了一种模糊的劫富济贫的侠义思想，但还谈不上有什么阶级意识。

1922年秋天，他正在高小读书，来了一个新的代课教师张效良（志和），他是个共产党员，宜兴人。原来在新加坡教书，因参加反帝运动，被英帝国主义分子逮捕，后来又被驱逐出境，不得已回到无锡教书。

这位张老师对冶方同志走向革命的道路起着重要的作用。原来的冶方同志虽然也不满现状，但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它，还只停留在桃花源式的大同世界的幻想中，这在当时的青年中是相当普遍的情况。由于张效良老师的启发和教导，冶方同志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正值江浙军阀混战，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因而普遍要求南北统一，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反对独裁。这使冶方同志感到非改革中国的腐败政治制度不可。“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军阀吴佩孚屠杀工人的行动，更激起了冶方同志对军阀统治的仇恨。此外，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使生长于民族工业的重地——无锡的冶方同志，深感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除了革命，是没有真正出路的，被压迫的工人阶级要求人身的自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是非走革命的道路不可的。总之，这时的冶方同志受到张效良老师的谆谆教导，已经初步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张老师同时又成了冶方同志心目中最崇高的人。后来他听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便立即要求介绍他参加。不久，张老师介绍他人了团。后来张效良因病回宜兴，无锡市的青年团组织失去了领导，工作上难以开展。幸而很快上海地委（领导江苏、浙江等地）派了董亦湘同志去无锡建党。1923年底（或1924年初）地委决定把无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全部转党，建立了无锡市第一

个党支部。并且指派冶方同志加入了国民党，以便扩大影响，开展工作。这个无锡党史上的第一个支部，当时只有六个共产党员。建立党支部的仪式是在城中公园内多寿亭与九老阁之间的一个草地上举行的，会议由董亦湘主持，会上还散发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与宣言。党员有唐光明，徐萼芳，糜辉等人。这些同志大多是店员、教师、学生。这些人散居乡间，而且都有职业，只有冶方同志是学生，就读的学校又居于城的中心，地点适中，与上海地委通讯也有利，因此大家一致推举冶方同志为支部书记。他担任支书工作一直到 1925 年 9 月出国时为止，在无锡市第一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虽然非常年轻，但他忠诚、勤奋，一面努力工作，一面学习新的知识。到了五卅运动时，他几乎以工作为主，读书为辅，专门做革命工作了。

其间，1924 年 7 月冶方同志考入荣宗敬办的公益商业中学（原来称为公益工商中学）。这个学校的旧址，现在是无锡第五中学。他在校读书一年零二个月，学力约等于旧制中学二年级。党支部成立以后的工作，除去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分部，实行国共合作，推动全市的国民革命运动之外，在江浙军阀混战时期，冶方同志同唐光明、糜辉等三人还在乡间发行过油印的反对内战的小报。

1925 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开枪屠杀中国工人与学生，引起全国的反帝浪潮。冶方同志领导党、团与国民党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了一次援助上海工人的游行示威。参加者有第二师范、县立师范、实业中学、辅仁中学、马可中学以及共青团办的辅西平民学校的学生，还有泰隆工厂工人、五七团、锡祉国民党青年组织等团体。规模可以说是相当盛大的，一路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打倒买办资产阶级！”“援助上海罢工工人！”等口号，声势非常浩大。此

外还出版了《青年评论》特刊，这是无锡市空前的一次群众爱国运动，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很大。6月7日，冶方同志还向党中央与上海地委作了书面汇报。他在另一次向中央写的信上说：“锡地工人自‘五卅’后渐有生气，将来很有希望，望派同志‘同志’的代号，着力活动一下，不要放松，在本年中一定成绩可观。”他的通讯处是：无锡老北门外三里桥洪泰烛店徐萼芳转。

1925年9月29日冶方同志给上海地委与党中央的信中说：“前两函由亦湘转上。高中的学生尚很糊涂，现在本级组织了一个级会，他们尚且反对，也不懂有什么宗旨，有什么要紧，将来恐难乐观。我现在主张个人谈话，向低年级中年纪轻的，头脑清爽的同学宣传。”从上面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冶方同志少年老成，已经看出对政治觉悟不同的人，应分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以唤起民众。

当时党与团的组织向上级联络或汇报，都要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主编杨贤江同志。那个地方像是一个同上海地委联络的地点。除了张效良、董亦湘、糜文溶外，上海地委还派了张秋人、恽代英、萧楚女、董星伍等同志到无锡去活动，经常联络的是董亦湘与糜文溶，可知当时党中央是很重视无锡这个工业城市工作的。党在无锡还办过工人夜校，地址在逸仙桥，由上海地委派人去管，无锡支部配合进行。五卅运动时党支部发动无锡工人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他们捐了不少铜元，可装几大箱。沸腾的工人群众的爱国热忱，大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这是第一次大革命中党领导群众爱国运动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冶方同志就是在这一次大革命中初露头角的。

当时上海地委直接领导无锡市的工作，是通过巡视员的办法来进行的，因此往往不及时。党的指示与书刊寄到无锡常常要隔一两个月。五卅运动后，冶方同志在暑假期间亲自到上海

沪西工人联合会下面去做一个宣传员，目的是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工人运动的经验。他小小年纪，便重视了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在上海工作了一两个月后，亲眼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工人的罢工足以使得帝国主义者发抖。他回到无锡后充满了信心，准备大规模地进行工人运动，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他的雄心壮志是令人叹服的。但在 9 月间他突然接到上海地委的通知，要派他到苏联去学习理论，这样他就离开了故乡，奔赴新的天地。

关于无锡市的工人运动的经验，1961 年冶方同志曾在南京一次演讲中总结过，现在看来还很生动，值得作为我们党史的一项重要史料。他说：“无锡工人是自发的，到后来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使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知识分子从无产阶级外面把马列主义灌输进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又是工人运动的结果。从无锡工人罢工来看是外来因素，工人运动不会自发产生马列主义。我们知道要搞工人运动，因此办了工人夜校，到上海去取经，看看上海工人运动怎样办的。事实上那时我在高小时已不搞功课，而是搞革命了。”（见孙冶方 1961 年在南京饭店一次座谈会讲话的记录，此稿存无锡市委党史办公室。）

当时无锡党的外围还有一个“无锡青年团”，是公开活动的，也是属于孙冶方同志领导的。冶方同志当时年仅十七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由于党的教育和领导，就已经成为一位具有相当能力的革命领导者了。

## （二）第一次受到诬陷

孙冶方同志自上海出发，1925 年 11 月间到达莫斯科。同行

者数十人，有不少人在国内尚未入党入团，如王明与博古。开始他进的是中山大学（以孙中山先生的“逸仙”命名，按理应称为“孙逸仙大学”），1927年夏毕业，分配到东方大学的中国班担任翻译。1928年初调到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原为中山大学），这个学校原以中国第一任苏维埃主席苏兆征命名，故应称为苏兆征大学，但习惯上仍称为“中大”。冶方同志在那里任政治经济学翻译。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所以连学校的名称也改变了。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国内派了大批的干部进了“中大”这些干部由于出身、修养不同对中国革命失败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争论是很激烈的。当时联共党内对国内外政策意见有不少分歧，对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意见也很不一致。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不仅引起了争论，也导致派别的形成，同时又不免要影响到“中大”里去。联共党内1927年上半年发生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称为“左派”），1928年又发生了布哈林的“右派”，即所谓联共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联共党内的分裂必然也影响到中国留学生，“中大”支部也发生了分裂，产生了宗派斗争。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控制着“中大”支部局。因为领导的作风不纯，引起了同学中大多数人的反对；又因为宗派斗争，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再因为支部局的领导爱戴帽子，乱打棍子，许多反对王明等人的同学遭到打击。冶方同志的遭遇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他始终都是乐观的，并且认为：“我在这个时期内确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是我在莫斯科学习中的一个较大的收获。”他的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后来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那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时期，“中大”的学生一半是国民党员，一半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蒋介石、冯玉祥的子女都在那里学习。中国最老的党员如

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明等也都在那里留学。除“中大”外，还有东方大学的中国班，也培养中国留学生。这部分同学懂俄语的极少，联共决定把两个学校的党团员联合成立一个支部，这就是有名的“旅莫支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支部书记由中共中央指定，当时支书即是后来叛党的任卓宣，又名叶青。冶方同志一到莫斯科就被指定为党的小组长。旅莫支部的党的领导方法与联共不同，基本上是中国封建行帮式的，实行家长独裁统治。旅莫支部反对同学学俄文，也反对攻读马列主义理论，提倡什么“革命的实际训练”、“武装训练”。支部还印发一种“训练工作指导纲要”，作为中国学生的学习课本。这个“纲要”明确规定：“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定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质上是只要实践，不要理论，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既然不必学理论，那当然也就不必要学俄语了。更奇怪的是“纲要”还规定要“消灭知识分子的恶习——一切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所谓“小资产阶级恶习”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指的个人自由意志和个人生活的自由。更使人吃惊的是，“纲要”说：“共产党员的相互关系就是互相监督。”不仅如此，旅莫支部甚至反对自由恋爱，不准看文艺小说，禁止唱歌、演戏。他们说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冶方同志曾说：“旅莫支部领导下的党内生活，全无民主与自由。支部局规定每隔二三天要开一次生活检讨会，要党员们互相揭发生活中小节问题，无限上纲，互相攻讦，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歧视、排斥与猜疑，毫无阶级友爱的气氛。谁要是埋头读书，就会被指为‘经院学派’，加以严格批评。党员的日常生活要由支部决定后才能行动，这叫做‘服从纪律’。实际上学校生活同军队差不多。任卓宣还滥用职权，俨然以家长自居，对同志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结果弄得大家只好谨小慎微，但求无罪，不求有功。旅莫

支部的负责人说这就是‘实际训练’。他们想把同学变成‘清教徒’和绝对服从命令的‘奴才’这就是旅莫支部领导者的真实意图。”开始时冶方同志对旅莫支部的作风与做法不甚理解，后来渐渐地由不满而反抗。幸而不久“中大”正式开学，共产国际与联共中央发觉了旅莫支部的错误领导，对校长拉狄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解散了“旅莫支部”，任卓宣调回中国，支部局改组，由董亦湘任支部书记，属联共中央领导。当时冶方同志起来揭发了支部局的错误，并对执迷不悟的同学进行了批评。“旅莫支部”解散后，他才得以安心学习。一年之后，学业大有进步，未等举行毕业典礼就和少数同学被分配到东方大学暑期野营班（学军事，法当俄语翻译。野营结束后，“中大”同期毕业生有很多转入军事学校去学军事理论或转入其他专门学校。冶方同志仍留“中大”做翻译工作。他与旧时同学时有交往，同董亦湘特别亲密。可是不久“中大”发生了一件宗派纠纷，在一次总结工作会议上，教务处一些同志对支部局发生斗争，结果董亦湘被撵下了台，取而代之的就是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小集团。他们的靠山是校长米夫，拉狄克因托派罪名于1927年初被撤职，下放劳改）。冶方同志虽然没有参加宗派斗争，但因同董亦湘友好，于是就被王明一伙所歧视。1927年夏天，冶方同志在夏令营工作结束后，又去“中大”工作，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分裂，中国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多数回国，学校也进行了改组。接着联共党内发生了反托派斗争，王明一派人以反托派积极，取得校长米夫的信任重用，后来又被选拔成为中国党的领导干部的苗子。这批人对董亦湘、俞秀松等老干部是排斥的，因此对冶方同志也视为异己。

1928年初的“中大”内部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件。有人谣传学校内部有一个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并说是以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明、孙冶方等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便乘机把他们作为‘靶子’来打击，制造了一个反革命的假案。事情发生的经过，确是很离奇的。原来治方同志当了翻译后，每月有一百多卢布的收入，手头比较宽裕。他住在中大教职员宿舍内，生活也比较自由。他为人又好客，因此常常喜欢在星期天和老同学们聚餐，在他的宿舍内烧中国饭菜吃。有一天，他约了董亦湘、俞秀松、周天廖、胡世杰以及一些军校的同学十多人共同会餐，其中还有左权、陈启科等人。他们多数是江浙人，也有非江浙人，如左权。这群青年人正在治方同志的室内谈笑风生的时候，不料正巧学生公社（即学生会）的主席王长熙路过那里，他在门外听到室内的谈笑声，便去向支部局打了个“小报告”捕风捉影地说：治方同志的室内有许多江浙人在谈话，好像是在开江浙同乡会。支部局的一些负责人本来就不满董亦湘这些人，听到报告后，立即利用时机，向米夫加油添醋地汇报说：“中大”有一个江浙同乡会的组织，他们是利用同乡关系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于是一传二，二传四，很快就传到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去了，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江浙籍的同学更为不安。那时我也在“中大”学习，因为也是浙江人，也未免惊心。支部局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还暗中派人到处侦察。这时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听到了谣言，他不经调查，只轻信支部局的汇报，立即怒气冲冲奔到“中大”，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当众宣称：“凡是在党内组织反革命的同乡会的，一律枪毙！”这句话虽然已过去了五十多年，但一回想起来，还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由此可见当时给大家震动的程度。中央总书记既然亲自下令要处决同乡会分子，那还了得，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于是“中大”的江浙同学纷纷向联共中央、中共代表团、第三国际东方部提出申诉，要求查明真相，免得大家人心惶惶。治方同志是当事人之一，于是他也写了申诉，否认有什么

“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因为事情涉及面很大，联共中央“国际”的监察委员会、中共代表团决定联合组织调查，查清此案。那时正值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召开前夕，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也亲自参加了调查。记得当时恩来同志几次找我谈话，我都坚决否认有这个“江浙同乡会”组织，并说我们新去苏联的同学没有一个参加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的。后来又由联共中央、东方部、中共代表团、区委书记、学校的党支部局共同召开会议进行对质、核实。会议参加者有孙冶方、王长熙以及当天参加聚餐的同学。支部局负责人有盛忠亮、王云程、博古等人。联共的监委主席首先问王长熙：“你怎样知道他们成立了江浙同乡会的？”王答：“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成立江浙同乡会。只是某天我经过薛萼果的宿舍，听到他们室内有江浙口音的人在讲话，其中有董亦湘，因此就向支部局去汇报了，只是说好像在开同乡会。”接着所有出席者都一致否认有这回事，最后联共监委主席作出结论：“中大根本不存在有江浙同乡会组织，只是部分同学的感情结合，不过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云云。闹了好久的“江浙同乡会”的案件至此总算搞清楚了。

会议以后，恩来同志又到“中大”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正式宣布了那个会议的结论。这件事虽然表面上过去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后果还是严重的。这主要是当时以王明为首的一些宗派分子的别有用心所造成的。他们接着又散布冶方同志有“政治问题”的谣言，弄得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同冶方同志接近。我当时常常看到冶方同志休息时一个人微笑地立在走廊上望着大家在熙来攘往地交谈活动，或者悄然地一个人在图书馆里读书。他在极端孤独中除了常去马列学院找董亦湘、俞秀松等老同志谈谈以外，完全采取一种“慎独”的态度。记得当时我好几次想问问他究竟为了什么这样孤立的，他总是避而不谈，

一笑置之，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身处逆境时泰然无愧的心胸。但是，即使他这样受到孤立，某些人还是不甘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到了 1931 年 1 月四中全会，王明一伙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后，冶方同志以及许多当时反对王明教条宗派小集团的同志，就更遭殃了，无不受到程度不同的进一步打击，再加上康生的大力支持，更是变本加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 （三）不幸中的大幸

1927 年底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否决了托洛茨基派对中国问题和对内政策的意见，托派因而转入地下活动。“中大”有一个当翻译的托派同学被指定住入冶方同志的宿舍。1928 年下半年联共开展了反布哈林——右派集团的运动，其中有一个当翻译的同学，因为赞成布哈林的政治意见，被当作“右派”分子，也被指定住入冶方同志那间不祥的宿舍。冶方同志虽然很小心警惕，不和他们谈心，但仍然避免不了一场灾难。原因是冶方同志没有向支部局去打无中生有的“小报告”，认为他知情人不报，包庇反革命。这时冶方同志的境遇，愈来愈恶劣，甚至于有些人看见冶方同志非但不睬，而且还怒目相视，以示其立场坚定。不可避免地这件事又同“江浙同乡会”联系起来，于是他就被当作托派嫌疑分子加以监视起来。

1930 年联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以肃清政治上持不同意见者，加强统一领导。清党一来，本来已经很紧张的政治空气，现在变得更加厉害，校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不正常，气候阴沉，人们都在暗中担心自己未卜的命运。清党一开始，就有一个托派支部的组织部长（中国学生）忽然战战兢兢地向支部局提供了一份“中大”内部的托派分子名单，次日此人也

就吊死在教室中。气氛一下子就变得极度紧张，接着根据这张名单，许多人都被捕了，但幸好其中并无薛萼果的名字，冶方同志总算逃过了这一关。可是支部局的领导人对冶方同志并未放松迫害，在清党时就坚决把他当作“阶级异己分子”立即开除出党。当时支部负责组织工作的，就是后来回到国内投降出卖同志的王云程、朱阿根之类，也即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他们对冶方同志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开除冶方同志的理由，说来也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1) 冶方同志的二哥是无锡大资本家的纱厂总管，所以他应作“阶级异己分子”处理；(2)对支部局态度暧昧，政治面目不清；(3)知道同房居住的“托派分子”与“右派分子”的行动，知情不报。

清党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冶方同志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立即向联共中央监委申诉。结果总算还好，没有开除党籍，但却给了他一个最后严重警告处分。理由是：(1)对托派的活动警惕性不高；(2)政治态度消极（也可能是政治面目不清）。还有一条什么，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当时他也不想抄决定，也不再去看什么，因为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无用的，能够保留党籍，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他说：“两三年来，在许多同志的心目中，早已把我看作敌人，不是说要枪毙，就是说要拘禁，所以我当时听到清党委员会在大会上口头宣布这个结论时，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当时认为只要保留党籍，回国后就有可能为党和革命继续工作，至于其他一些“结论”，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实践会证明谁是谁非的。所以他连结论都没有抄。在清党大会一结束，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会场。这也说明冶方同志在遭到不幸和挫折时，首先想到的是能继续更好地为党工作，至于个人的委屈可以暂不计较。这是一个具

有多么宽广胸襟的革命者啊！

#### （四）到工人中去

留苏五年，冶方同志的收获是巨大的，他由对社会主义的朦胧憧憬到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懂得了，尽管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只要有一个无比坚强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去领导革命，理想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就一定会实现，并由此而向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要到烈火一般的革命前线去战斗。他就是抱着这样的理想，背着“最后严重警告”的沉重包袱，回到了祖国的上海，决心到工人群众中去锻炼自己的斗志。1930年9月他回到上海后，党中央派留苏同学恽雨棠同志前去接待他，随后又由潘汉年同志约他谈话，通知他党决定派他与恽雨棠同志一起去做人力车工人的工作。恽雨棠同志是江苏常州人，是在商务印书馆从事党的活动的老党员，1927年底在“中大”时曾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和冶方同志在苏联时都是坚决地反对王明一伙野心家的。恽雨棠同志于1929年就先行回国工作，那时他担任上海人力车工会筹备会的主席，后来党又决定冶方同志任副主席。雨棠同志鼓励他努力工作，不要顾虑在莫斯科的严重打击，并说：“中国党对我们这批在莫斯科反对支部局的同志并无成见，现在革命运动发展很快，需要大批干部，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不怕牺牲，是不难取得党的信任的。”冶方同志听了很高兴，下定决心学习俄国的革命者“到民间去”的优良传统，脱下西装，走到工人中间去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党、团员，对于到工人中间去工作，有一种说不出的光荣感，我们当时都有一种共同的认识：中国革命会同俄国的模式一样，必然由城市到农村，对于革命形

势，当然也认为很快就要胜利，以为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当时党的“六大”接受了“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认为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的尖锐化”的阶段，各国党的任务是发动大规模的政治罢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上海当时是被看成中国的“彼得格勒”的，所以要求它首先发难，然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完全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幼稚的估计，就是当时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王明路线的主要依据。冶方同志离国已久，当然相信党中央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他工作积极，想立即把上海的人力车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更牢记雨棠同志的话：“只要不怕牺牲，努力工作，不难取得党的信任。”当时他的确情绪很高，欣喜已经获得了工作的机会，可以在实际工作的考验中来证明自己是否对政治消极，是否配做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事实决非像主观想象的那样简单，立三路线是完全带有破坏性的盲动，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失败，在几次强迫命令之下的总罢工，把已经非常薄弱的工会组织也都给摧毁了，哪里还说得上在上海建立什么苏维埃政府！那个时候我也在上海做工人工作，对这一点的体会是十分深刻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后果是打草惊蛇，引起敌人的疯狂镇压，由于党的严重脱离群众，使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被杀，这是继党的“八七”会议、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以后的又一次巨大的损失。冶方同志与雨棠同志经过实践，渐渐地懂得了这样“大干”是错误的，很想向党建议改正革命方式，但他们都不敢向中央去反映情况或提反对意见，因为他们都知道李立三同志的家长作风很可怕，只要稍不小心，说出违反他的决定的意见，那就有立即被开除党籍的危险。何况冶方同志背上还有一个“最后严重警告”的包袱。因此他为了留在党内，为党工作，只好克制，忍耐，服从。冶方同志工作了几个星期后，雨

棠同志被调到南京去任市委书记，人力车工会的主席由冶方同志接任。他负此重任，工作更加艰苦，日夜不停地在马路上奔走，经常跟着几个人力车工人到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去进行活动，发动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而斗争。他这样工作了二个月后，上级又决定调他到沪东区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去任主席（工联前身是上海总工会，四中全会后改名）。当时沪东区党的工作基础也非常薄弱，只有四五个工厂有些工作关系。工人都怕与“赤色工会”接触，他们在十分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怕失业、怕饥饿，只好敢怒而不敢言。这并非工人不要革命，而是当时我们的工作方法完全不适合客观条件。所谓工会筹备会的机关，实际上就是党的秘密机关（当时党群机关不分）设在一个老百姓的灶披间里（自然是租来的），由一个住机关的女同志作为户主住在里面。这个地方对外当然不能公开，每晚只有两个工人积极分子来工会汇报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党的机关报——《上海报》的一个采访员和一个从苏联回国在家养病的同志常去那里。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已由王明等领导。冶方同志有一次在党的沪东区委机关召开的会议中见到了留苏同学张琴秋（女），当时上级正派了李初梨来传达四中全会的决议。这个会议讨论的时间很长，从晚上一直开到次日早晨，才告结束。会后冶方同志到外面去买些点心充饥，想再去区工会机关联系工作。不料走到那里，只见门窗紧闭，从窗缝中看去，室内满地堆着被抄家后的东西。他心知有变，立即回身走到弄堂口，正在徘徊想找人打听一下情况时，突然看见二房东走了出来，一打听，果然是机关已被破坏，住在那里面的女同志已经被捕。他听完情况立即转身就走，想赶到区委去汇报。不想中途遇见了张琴秋。她慌忙告诉他，区委机关在开完了会以后，不久即被巡捕房来人搜查，幸而人都已散去，没有被捕者，但此后

肯定再不能去了。不久恽雨棠和他爱人李文同志又被牵连而遭被捕 2月7日与林育南、何孟雄等二十三位烈士，一齐在龙华牺牲。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引为教训的事件。

但是谁是这两个机关被破坏的告密者呢？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后来查明原来是这样的：

恽雨棠同志夫妇出事之前，他俩从南京来上海，目的是为了参加全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筹备会，因为四中全会开会，他就等在上海，住在原来居住的地方。他的爱人李文同志正在待产。恽雨棠同志很想见见冶方同志，谈谈工会工作。他托《上海报》的那个记者带一张条子给《上海报》编辑周天僂，想由周转告孙冶方要孙去他家面谈。《上海报》的记者也与恽雨棠同过事彼此是认识的，恽雨棠同志对他很信任，所以不顾危险，托他带字条去，字条上面是写有他的地址的。谁知这个记者不久被捕了，他马上供出了区工会机关与恽雨棠的地址。冶方同志得知工会机关被破获是由于那个记者告密，他就去找周天僂相商，两个人认为应当立即通知恽雨棠，找到后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以防万一。但恽雨棠同志认为不至于发生问题，他以为条子既已转给了周天僂，叛徒可能没有看过条子或者已经忘记了上面的地址。因此他们夫妇两人没有离开已经暴露的地方，当时冶方同志也没有坚持己见，彼此都很麻痹。次晨，敌人果然按地址捕人，恽雨棠夫妇终于惨遭杀戮。这件事对于冶方同志来说，他常常当作终身的憾事，他常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由于党的工会机关不断地被破坏，工人运动已无法进行，党与工人群众实际上脱离了关系。自从沪东区工会被摧毁后，只留下冶方同志一个人了，他只好要求上级派他进工厂去搞工人运动，徐图发展，重建工会。上级口头上同意，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上面再也没有人来找他，他就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后